

文學
叢書

滿族崛起与
清帝国建立

李鸿彬 著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

李鸿彬/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 / 李鸿彬著 .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 2003.1
(学者文丛)

ISBN 7 - 80504 - 935 - 1

I . 满... II . 李... III . ①满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中国 ②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清前期
IV . K282.1 ②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800 号

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

李鸿彬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铁道部十八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字数 24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 - 80504 - 935 - 1

定 价 : 20.00 元

序

□ 秦宝琦

著名清史专家李鸿彬教授一生研究的结晶《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终于出版了,从而实现了他生前的一个宏愿,也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李鸿彬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就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勤奋好学的品质。1960年从北大毕业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教研室和清史研究所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在工作中总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在清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不仅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而且亲手创办了《清史研究》并担任主编多年。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更是令人瞩目。正如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所说:“鸿彬教书育人,可为人师表;主持编刊,甘为学人铺路;他潜心治学,自成一家之言,在我国清史尤其是清前史研究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这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

鸿彬一生著作颇丰,仅有关清史的学术论文就多达一百五十余篇,其中不少还是在身患重病期间完成的。综观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清前史方面有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清王朝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乃是“外族”、“异族”,而清入关建立清帝国,乃是“外族”、“异族”对中国的“入侵”,明清两个王朝的更迭,则是历史的“倒退”,视明朝的汉人政权为“正统”,而视满族建立的清王

朝为“异端”。鸿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撰文指出，满族既然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那么，满族的崛起与明朝的衰亡，无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应该充分肯定清朝的历史地位，从而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发展。

其次是在学术观点上求实创新。

鸿彬在清前史研究方面，一直坚持求实创新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他对清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看法，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过程、明清战争，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一系列创见。例如关于努尔哈赤之死，历来的说法是，因为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中炮重伤而亡。而鸿彬却根据新的史料，考证出所谓“炮伤说”乃是根据朝鲜人李星龄的误记流传下来的错误说法，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努尔哈赤死于病疽。再如，关于满族的祖籍问题，鸿彬也提出了新的看法，指出努尔哈赤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黑龙江北岸，从而科学地解释了努尔哈赤祖先的由来。

第三是资料翔实，言必有据。

鸿彬的学术论文皆言之有据，不讲空话，每个论点、每个结论皆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他所使用的每条史料，也都经过严格的考证。他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了大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资料，在文献资料中，又特别重视明清档案和稀见的史籍，包括满文和藏文的史料，此外，还引用了诸多朝鲜文和日文的资料。

鸿彬生前一直希望自己多年来在清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撰写成一部全面、系统的清代前史。不幸从 1992 年起他就患上了重病。在患病期间，他仍然念念不忘终生奋斗的清史研究工作，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从所撰写的一百五十余篇学术论文中，精选出数十篇精品，准备改写成专著。可惜，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使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实现。值此鸿彬逝世两周年之际，鸿彬夫人提出把鸿彬论文整理出版的想法，并得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作为鸿彬生前的同学、挚友和同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

鸿彬夫人吕姝清教授的委托，在鸿彬生前初步整理的基础上，编辑成《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这部专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部著作仅仅反映了鸿彬全部研究成果的很少一部分，而且是按照论文的内容编辑而成，尽管还不是一部全面、系统的清前史，但是，却包括了清前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本书能够对我国清前史的研究有所推进，受到读者的欢迎。我非常同意李治亭教授在纪念鸿彬辞世一周年时所说的：鸿彬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思想、做人与治学精神，是他留给清史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这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就是鸿彬教授留给我国清史学界的珍贵遗产之一。

2002年10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前　　言

我国自古以来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进步，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满族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关外满族崛起，关内爆发农民起义，如同两股波澜壮阔的洪流，猛烈地冲击朱明王朝的统治基石，使其摇摇欲坠，大厦将倾。

满族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兵统一了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建立后金政权，从狭窄的苏子河流域进入广阔的辽沈地区，满族由落后的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

皇太极即位后，其父努尔哈赤留下的并不是一桌丰盛的筵席，而是“邦家未固”的严重局势。他审时度势，提出了“讲和自固”的战略方针，争取时间，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面比较全面的改革，使汗权加强，满族贵族之间和满、汉之间的矛盾得到和缓，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兵力强盛，加速了后金封建化的进程。同时消除了东面朝鲜，西边蒙古的威胁和后顾之忧，并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明朝在关外的精锐丧尽，从而为清军入关铺平了道路。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清朝、南明和农民军(大顺、大西)政权三种政治势力鼎足的局面，实际上以清朝为一方，以南明和农民军抗清为一方，双方对垒的态势，就实力而言，抗清一方占优势，清朝则处于劣势。这种优势和劣势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能以此决定胜负，其中人的因素很重要，如果从双方决策者的素质来看，

清摄政王多尔袞无论是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都比抗清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以及南明诸王要高明得多；若从双方内在的凝聚力考察，清方满族内部比较团结，使内耗减少到最小程序，而且联合蒙古，团结汉官，形成了满、蒙、汉统一战线。抗清阵营内部十分涣散、矛盾重重，这时急需一位足智多谋、捐弃前嫌的英雄人物来组织和领导这支队伍，可是没有人能承担此项使命，因此互相猜忌，各自为战，如当大顺军李自成处于危难关头时，大西军张献忠却袖手旁观。而南明与农民军积怨太深，企图以割地纳款联合清军攻打农民军，农民军曾一度联明反清，南明却无诚意，貌合神离，借刀杀人。历史辩证法则是无情的，抗清阵线由优势变为劣势，清朝则由劣势转为优势，最后清朝完成了清初的统一。

明末清初是风云变幻、新旧王朝更迭之际，各种政治势力都在进行较量，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人物，各自选择自己政治坐标，去拼搏奋斗。于是在历史学家的笔下出现了既肯定皇太极，又肯定袁崇焕；既肯定多尔袞，又肯定李自成；既肯定范文程，又肯定郑成功等似乎十分矛盾的评价，其实并非矛盾。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历史是由各种合力组成的，以上人物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肯定他们是科学的，符合历史真实的。

清王朝虽然是我国封建王朝的延续，但面临的历史任务却有别于前朝。当时西方殖民者开始东侵，国内仍存在敌对势力，因此巩固国家统一，抗击外国侵略，实现全国的社会稳定，恢复和发展生产，则是其历史使命。随之，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展宏图、厉行改革、文治武功，从而完成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大业，为我国疆域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长期战乱遭到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兴盛，人才辈出，许多学科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于是出现了为世人讴歌的“康乾盛世”，成为屹立在东方的强大的中华帝国。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历了近百年的“康乾盛世”，而五十年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其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推

行闭关锁国政策，没有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未能用变革的手段，达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追赶上来的目的，却沉醉在“天朝上国”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无知，造成近代中国惨痛的历史教训。

著者
1999年春节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满族的由来与形成.....	(1)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1)
第二节 满族的祖籍.....	(5)
第三节 明代女真(满族)铁业的发展.....	(10)
第四节 关于三万卫.....	(19)
第五节 后金对朝鲜的两次战争.....	(32)
第六节 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	(59)
第二章 清朝的开国.....	(87)
第一节 努尔哈赤与萨尔浒之战.....	(87)
第二节 宁远之战与努尔哈赤之死.....	(99)
第三节 皇太极的继位.....	(114)
第四节 清朝开国及其对明议和策略.....	(125)
第五节 皇太极与松锦大战.....	(158)
第三章 清帝国的建立与全国的统一.....	(186)
第一节 多尔衮与山海关大战.....	(186)
第二节 孝庄文皇后在清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203)
第三节 清初杰出的汉族政治家范文程.....	(213)
第四节 清王朝与大顺政权的战争.....	(221)

第五节	洪承畴在清初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238)
第六节	清廷对东南各地的统一	(249)
第七节	康熙统一台湾	(286)
第八节	施琅、吴三桂与澎湖海战	(298)
第四章	康乾时期的安内与攘外	(323)
第一节	康熙平定噶尔尼叛乱	(323)
第二节	乾隆时期的金川之役	(331)
第三节	清廷反击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	(346)
第五章	清前期几位杰出的科技人才	(369)
第一节	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	(369)
第二节	火器制造家戴梓	(377)
第三节	农学家杨屾与《豳风广义》	(381)
后记		(388)

第一章 满族的由来与形成

第一节 满族的先世

清王朝的建立者满族的先世，学术界已经发表过诸多的论著，这里不准备对此做系统的论述，仅从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看到唐张建章墓志铭，做进一步探讨。此墓志是 1956 年 11 月在北京德胜门外冰窖口附近出土的，志石两块方形，志盖刻篆书“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四行十六字。志文楷书，三十二行，满行三十一字，共计九百零九个字。这块墓志的出土，对了解和研究唐朝与渤海关系的历史，颇为重要。

隋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靺鞨人分为七大部分。其中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和辉发河流域的粟末靺鞨部，到了公元 7 世纪末，兼并周围各部，势力日益强大。698 年（唐圣历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自立震国（或作振），称震国王。705 年（唐神龙元年），唐中宗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抚，大祚荣随即归附。713 年（唐开元元年），唐玄宗派遣郎将崔忻前去粟末地区设置忽汗州，任命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并册拜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于是大祚荣“去靺鞨号，专称渤海”^[1]。可见史称“渤海国”之名是由唐王朝的册封而来的。

渤海是唐朝的地方政权，辖地东起日本海，西达大兴安岭，南接新罗，北抵黑龙江，管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自大祚荣时代到为辽所灭，共经历十五世二百二十九年。这个时期，渤海和唐

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些除了大量文献记载外，张建章墓志就是很好的历史物证，它是继崔忻“鸿胪二井”^[2]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其志文不仅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从而更使我们增加了具体深入的认识，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两点：

第一，当时的渤海和唐朝保持着严格的臣属关系，渤海地方政权，为了向唐朝中央政府报告地方情况，缴纳贡赋，经常遣使朝贡，据统计“渤海十五王中朝于唐者，凡一百三十二次”^[3]。而唐王朝也不断派敕使赴渤海，宣谕朝命，检查地方工作。张建章就曾奉命出使渤海，可是关于这次出使活动，现存的唐代文献皆不见，新旧唐书也无记载，只是宋人所著《北梦琐言》、《南部新书》中，曾提到张建章赴渤海一事，内容非常简单，不能说明问题。根据《玉海》的地理类转引《唐志》的记载说：张建章所著《渤海国记》是在唐文宗大和年间。又据《宋史》王溥传的记载说：唐大和中，有幽州从事张建章著《渤海国记》。因此，近人金毓黼先生在他所著的《渤海国志长编》一书中，推论认为张建章出使应是835年，即唐文宗大和九年^[4]。由上可见，有关张建章这次出使渤海的历史材料很少，更不能很好地说明唐朝与渤海的关系。

但是，张建章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次出使十分具体而又翔实的史料。根据志文记载，张建章，字会主，北平人。生于807年（唐元和二年），卒于868年（唐咸通九年），享年六十一岁。833年（唐大和七年，即癸丑年），张建章二十七岁时，因为“渤海国王大彝震遣司宾卿贺守谦来聘”，所以唐王朝也要遣使前往渤海，经过“府选报复”，决定派张建章“假瀛州司马，朱衣使行”出使渤海。这年的秋天，他从山东登州，“方舟而东，海涛万里”，渡过渤海，经旅顺，于“明年（即834年，唐大和八年）秋杪，达忽汗州”。渤海王大彝震对唐的来使，“重礼留之”，张建章对此盛情难却，只好“岁换而返”，临行时“王大会以礼，货宝器名马文革以饯之”。835

年(唐大和九年)八月,他回唐“复命”,顺利地完成了这次出使渤海的任务。以上志文所述张建章出使经过,可以补充和更正过去文献记载的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

第二,自宋以来,有些人的著作中记载说,张建章曾著有《渤海国志》一书,如《新唐书》艺文志所记:“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又如《宋史》艺文志也记:“张建章渤海国记三卷”,等等。因为《渤海国记》是张建章出使渤海以亲身耳闻目睹撰写而成的一部专著,所以一直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可是《渤海国记》早已失传,仅留一份存目,至于此书内容,人们一无所知。然而据张建章墓志志文的记述,他出使渤海回来时,“凡所笺启赋诗,盈益缃帙,又著渤海记”。这就证实了张建章的确写了一部《渤海记》。志文又说《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由此可知,它记载了渤海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后晋刘昫撰写的《旧唐书》艺文志里,没有收录张建章的《渤海记》,而宋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艺文志中把此书收进去了。这说明刘昫很可能没有看到张建章的《渤海记》,后来的欧阳修却看见了。这从新旧唐书所写的渤海两传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旧唐书》渤海传,只是简略地述说了渤海建立、诸王相袭、唐和渤海关系的情况。可是《新唐书》渤海传,除了充实丰富了《旧唐书》所记的内容外,大量地增加了有关渤海的地方建制、行政区划、官员设置、物产分布和社会风俗等情况。如果按照志文说《渤海记》“备尽岛夷风俗,宫殿官品”来考虑,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渤海传时,参考了张建章的《渤海记》。因此,我们可以想见《新唐书》比《旧唐书》增补的内容,很可能就是《渤海记》里的。

现将张建章墓志录文如下:

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番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
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安定张公墓志铭并序。

从兄幽州节度掌书记中散大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珪撰。

弟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总章书。

公讳建章，字会主，中山北平人也。其先受氏于轩后，系祖于前凉，降及冠冕閼閻，历代沿袭家牒详备，故编近以识□。高祖賴貞，皇特进朔方节度副大使知使事鄯国公贈司空。曾祖闔，皇特进太府少卿充河北陆运使临泾侯贈太子少傅。祖诜，皇儒林郎守定州北平县远知县事。考操，皇通议大夫检校太子右諭德涿州別駕。公幼聰而俊晰，美而和時，謂間生琳琅，乡中英妙，洎青襟從師，丹霄有志，年十六，云水興高，風月吟苦。旋自試于秋賦，明敏著名，尚持疑□春□，琢磨益厲。大和四載，博陵歎，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謀曰，仲由負米，毛義捧□，孝敬之行也。予獨何為，執以厥養，□親便近游方者燕，既館□碣石。太保李公□□麾之安次尉，逾年李公入覲，弘農楊仆射受餚，星紀再周、渤海國王大葬震，遣司賓卿賀守謙來聘。府選报复，議先會主假瀛州司馬，朱衣使行。癸丑秋，方舟而東，海濤萬里。明年秋杪，達忽汗州，州即挹婁故地，葬震重禮留之，歲換而返□，王大會以禮，貨寶器名馬文革以餞之。九年仲秋月，復命，凡所箋照启賦詩，盈益絢帙，又著渤海記，備盡島夷風俗，宮殿官品，當代傳之。歷司徒史□知而竟□，至太尉，張公以素分擢受節度，隨軍，委之草檄，詢之運籌，破虜荐名，授節度巡官，監察御史里行；尋遷幽州節度掌书记，轉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拣琳之筆，勒班超之功。

不幸府故，嗣襲福王遙即，公入處賓寮，遷尚書

主客员外□兼□史，赐绯鱼袋，将还加水部郎中，充观察判官，无何，工部奏遣归阙，汝南周公代未□而捐馆。保相清河公弓招，表升驾部郎中，余如故。□□明之典，加兵部郎中，幽州节度判官。大中十二年敷奏，对扬大悦，圣旨面赐金紫兼御史中丞，贾生宣室之□，方朔辩对之机，百辟荣观。咸通五年四月，奏升押奚契两番副使正议大夫检校左庶子兼御史大夫储□清崇。亚相显贵。六年十月，摄蓟州刺史诸军事，期幸麦之端，□□袴夸之谣、渔阳大理。七年九月十日，大病于官舍，享年六十一，词锋没于逝川，学□□为朽壤悲人。夫人京口韦氏，先公而谢五年矣。以咸通八年二月二日，迁室于府城东南七里邓村之原，用鲁礼。有子二人，长曰奠，前莫州任丘主簿，迁衡前将，葬曰小丑。有女一人，适归义县丞石令存，皆□慕□诉，以珪通旧且宗。请志陵谷，铭曰，碣石山高兮，上捧其星。桑乾水远兮，下注沧溟。中有崇□兮，叶吉泉扃，贤人官业兮，万古方馨。

第二节 满族的祖籍

关于清代满族祖籍的记载，无论是官书，还是私著，都肯定是指长白山，几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官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此书称：“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

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地名)鳌朵里(城名),内有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三酋长……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华言金也)觉罗(娃也),名布库里英雄。……三酋长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5]

这段脍炙人口的动人传说,以后有清一代凡叙其满族祖先起源时皆缘之。这个充满神奇幻想的神话,虽然有些情节荒诞无稽,但是并非毫无根据,在一定的程度上和某些方面则是客观现实与生活斗争的反映。它清楚地告诉人们满族先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英雄,生长活动在长白山东麓布库里山下布儿湖里湖和鳌莫惠的鳌朵里城一带,鳌朵里城则是始祖布库里英雄居住的地方。

那么鳌朵里城在何处呢?同该城相联系的布库里山、布儿湖里湖、鳌莫惠又在何处呢?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黑秃阿喇(辽宁新宾)距鳌朵里西千五百余里”^[6],尽管知道了鳌朵里城的大体方位,但是仍无法确切知道鳌朵里城址。所以,到了康熙时期,他为了弄清楚自己的祖籍,便于康熙十六年(1677)特命内大臣觉罗武木讷等人,前往长白山进行调查,所谓“专官访求,备历险异”,并“召村庄猎户”询问,皆“无知其处”^[7],结果就把“树峻极之雄观,萃扶舆之灵气”^[8]的长白山作为祖宗的发祥地。自此直至乾隆初年,仍然不知道鳌朵里城在哪儿,因此我们看到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重修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雍正十二年(1734)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校订本》、乾隆四年(1739)成书的《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都承袭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说法,只是在个别字句上加以修饰润色,其他内容无一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乾隆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的《大清一统志》记载:

勒富善西岸有鄂多理城,周一里一百步有奇,门三,四围有濠,子城周百步有奇,南一门,本朝初定三姓之乱,国号满